

热望

学习“两个务必”
永葆政治本色

黄苇町

红旗出版社

期望

学习“两个务必”
永葆政治本色

黄苇町



红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热望:学习“两个务必” 永葆政治本色/黄苇町著.

—北京:红旗出版社,2004.7

ISBN 7-5051-0979-0

I. 热…

II. 黄…

III. 中国共产党—党的作风—学习参考资料

IV. D26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3101 号

热 望

——学习“两个务必” 永葆政治本色

黄苇町 著

责任编辑:洪 琪 封面设计:孙翠之

红旗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100727 地址:北京市沙滩北街2号

E-mail: hqcbcs@publics.bj.cninfo.net

编辑部:64037144 发行部:64037154

印刷:廊坊市百花印刷有限公司

2004年7月北京第1版 2004年7月河北第1次印刷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5.125 字数:90千字

ISBN 7-5051-0979-0

定价:10.00元

展板

飘散着战地硝烟

钟声

催发征途新的鼓点

多少心语

凝成一句：珍重

为过去

更为明天

本书音像版已制成六集专题讲座 VCD 光盘

中联文化传播集团制作

红旗音像电子出版社出版

第一讲 不忘“两个务必”**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1

1. 历史转折之魂 7

2. 共产党人的魅力从哪里来? 24

3. 树立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 40

第二讲 牢记“两个务必”**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57

1. 从革命为民到执政为民 59

2. 求真务实才能保持血肉联系 77

3. “两个最大”要警钟长鸣 86

目
录

第三讲 贯彻“两个务必”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99

1. “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是
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方面 101

2. 发展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是
“两个务必”的重要内容 117

3. 坚持“两个务必”
也要搞好制度建设 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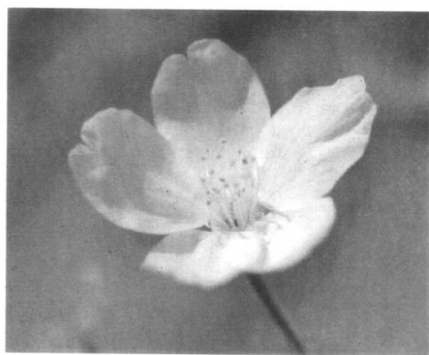
4. 牢记“两个务必”要落脚于
“执政为民” 1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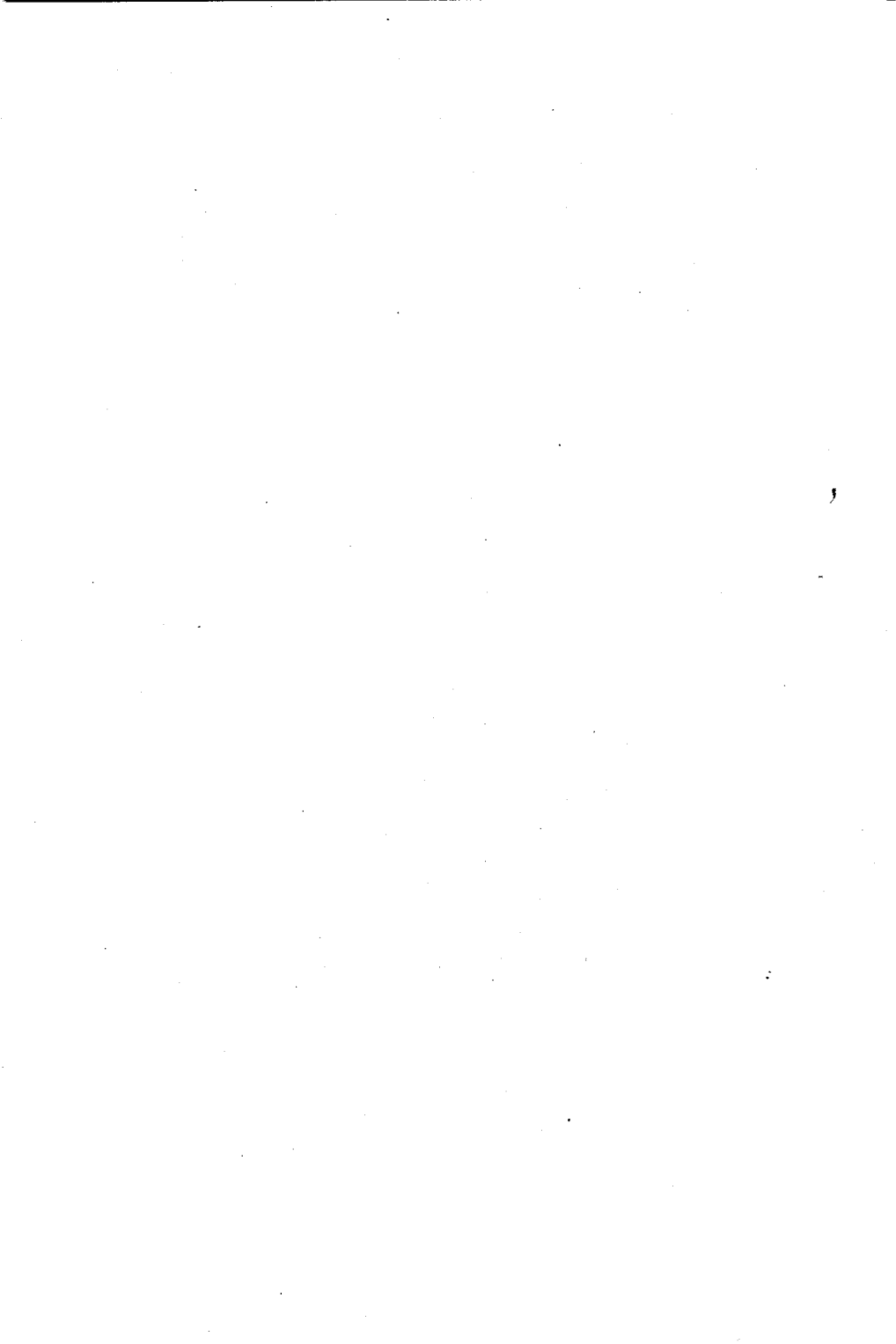
学习文件 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 143**

第 一 讲

不忘“两个务必” 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一展激起千重浪。

在北京人的记忆中，最有资格用这句话来形容的展览，这10年有两次。

一次是1995年底1996年初举办的《红岩魂——白公馆、渣滓洞革命烈士斗争事迹展览》，产生了出人意料的轰动，45天便接待了62万观众。这一热潮被新闻、理论界称为“红岩魂现象”。

另一次，就是前不久举办的《牢记“两个务必” 永葆政治本色——西柏坡精神巡回展览》，当时正值北京持续高温天气，展馆外的地面晒得发烫，但人们仍排起长龙。馆内，人潮涌动，万人争睹。媒体又将其称之为“西柏坡热”。

无论“红岩魂现象”还是“西柏坡热”，反映的都是广大干部群众对党的革命传统的挚爱与怀念。两个展览反映的时间跨度也几乎相同：都是解放战争时期。不同的只是，一个再现了敌占区中被监禁的共产党人的艰苦奋斗和英勇牺牲；一个再现了在我们党和军队的指挥中枢，我们党的领袖们对“两个务必”的率先垂范和高瞻远瞩。这就决定了后者必然是从更广阔的视野、更高的层次来再现这一伟大时刻的伟大思想。在展馆中这个进入繁华都市的“小山村”，人们再次感受到一种返回精神家园的亲切和熟悉，一种远离尘世喧嚣与浮躁的

美。这也是“西柏坡热”还在不断升温的重要原因。

人们还记得，也是几年前，江泽民同志视察西柏坡时，曾向全党发出“牢记两个务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号召。而2002年12月5日，一个与这次展览时的季节正好相反的严寒天气，党的十六大闭幕刚20天，新任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又带着不少中央领导同志坐着大客车，顶风冒雪、风尘仆仆地奔赴西柏坡。胡锦涛同志说：“我们这一次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来西柏坡，可以说是来上学的。”他还发表了重要讲话，号召全党同志牢记“两个务必”，艰苦奋斗，居安思危，保持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

西柏坡精神为什么受到这样高度的重视和景仰呢？应该说，是有着浓厚的历史情愫和重要的现实原因的。

虽然，西柏坡只是河北平山的一个三面靠山、一面临水的普通的小山村，但它是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55年前，我们党在这里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指挥了震撼世界的三大战役，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

这里还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这些革命伟人进入北京前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在长达10个多月的日子里，他们住农家院，吃农家饭，每天生活在群众当中。然而就是这群粗茶淡饭、衣着朴素、说话和气的人，在这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在这

里筹划了新中国的诞生。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同志会见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过：在我的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三年。那时我们的装备很差，却都在打胜仗，这些胜利是在以弱对强、以少胜多的情况下取得的。因此，党中央在西柏坡的时期，是我们党在革命年代最成功、最辉煌的时期。这些都不能不给这个小山村添上许多传奇色彩。

更重要的是，西柏坡是我们党由农村向城市、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由夺取政权向建设国家的历史性转变时刻的具有特殊意义的革命圣地。作为一个哺育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永葆政治本色的摇篮，它已经成为了一种精神和传统的象征，那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务必”，也是西柏坡精神的核心和灵魂。

“两个务必”，不仅回答了我们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历史原因，还特别提出了全国解放后，共产党人怎样正确对待胜利和执政的考验，怎样防骄戒奢，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重要原则。这就决定了它的思想意义，已经远超出它所提出的年代，甚至超出了那一代共产党人生活的时代，而一直延伸到我们党执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延伸到我们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

军。应该说，“两个务必”不仅教育和武装了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的党员、干部和群众，而且已经成为我们党执政后永不变质的政治本色。

这就是胡总书记一上任就带领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去西柏坡的原因，也是那么多党员干部和群众踊跃、自发地去参观巡回展览的原因。特别是许多老同志睹物思人、热泪盈眶的感人情景；许多青年学生认真抄录、深沉思考的神态，都说明展览在他们心头引起的强烈共鸣，也说明了人民群众对我们党坚持和发扬“两个务必”传统的热切期盼。

因此，牢记“两个务必”，既是我们党中央领导人对自身的鞭策，对全党的要求，也是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我们党的希望和期盼。孙子兵法中有这样一句话：“上下同欲者胜”。就是说，如果统帅和士兵的愿望和要求都是共同的，上下同心，那打胜仗就没有困难了。“两个务必”不仅是我们在战争年代克敌制胜的法宝，也是我们完成十六大提出的战略目标的重要的精神财富。

“两个务必”虽然只有两句话，但作为我们党的政治传统，它所包括的历史内涵、思想内涵和时代内涵都是十分丰富的，要真正理解它的全部意义，必须了解其产生的大背景和发展丰富的历史过程。

1. 历史转折之魂

“两个务必”的重要论述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产生于中国革命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时刻，就是伟大的历史性转折的时刻。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党中央驻留西柏坡的日子，中国革命正面临三个重大的转变：

第一个转变是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变。

大家都知道，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开始走上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式的革命道路。那时由于城市反动统治势力比较强大，我们只能从反动统治薄弱的农村地区发展和积蓄革命力量。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有句“名言”，叫“穷山恶水出刁民”。所谓的“刁民”，就是利用统治者的鞭长莫及，敢于“蔑视王法”，和他们斗智斗勇的“造反者”。这在我们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时期尤其明显。尽管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在高峰时曾发展到了十几块，大的都有几百万人口，但有一点没有例外，那就是全在中国最穷的地方。因为那些好一点的地方，不要说城市，就是物产富庶的鱼米之乡，也几乎都被反动派占光了。当然，有时红军也能打下大城市，例如1930年7月，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曾经攻占湖南省会长沙达9

天，在中外反动派中引起了很大震动。但在当时红军力量弱小的情况下，打下来大城市也不可能长期站住，因为反动派一定会拼命来抢。红军能站住的或是穷乡僻壤，或是多省交界的“几不管”地带，而且在敌人来围剿时还要有进有退地周旋。但我们党就是靠长期占据这些农村地区，建设农村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的。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了重大转折，在1944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我们党才把准备夺取大城市提到日程上来。

当时，毛泽东同志在他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中说：我们十多年来是处在农村中，提倡熟悉农村和建设农村根据地，这是必要的。但是现在不同了，如果我们现在还不准备城市工作，不学习管理工商业，我们也就不能把日寇赶出去，也就不能解放全中国。在1945年5月召开的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同志则明确地把“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问题提到全党面前，他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当需要在乡村时，就在乡村；当需要转到城市时，就转到城市。现在要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需要用很大的力量转到城市，准备夺取大城市，准备到城市做工作，掌握大的铁路、工厂、银行。说明我们党认识到，由于力量对比的变化，夺取城市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毛泽东还风趣地说：像北平、天津这样大的三五个中心城市，我们八路军就

要到那里去。我们一定要在那里开八大，有人说这是机会主义；恰恰相反，八大如果还在延安开，那就近乎机会主义了。以后的事实证明，我们党的八大果然是在北京召开的。不过已不是原来设想的三五个中心城市了，而是全国除台湾以外的大中小城市都在我们手里，整个中国都已经解放了。

因此，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的斗争主要就是争夺城市。哈尔滨是我们首先解放并站住了脚的第一座省会级大城市。但是，当时党内许多同志包括有的领导干部，对此还没有实现必要的思想和观念转变。由我们党任命的哈尔滨市市长刘达回忆说，当时有一位省委领导问他，哈尔滨能挖出多少财宝？他回答：资本家和地主不同，可能挖不出多少。随后，这位领导同志就要他准备三四百人的住房，说已选好几百农民来哈尔滨市挖财宝。当然这个想法还未来得及实施就被制止了。

但是，随着东北许多城市的解放，类似情况又在他一些城市相继出现，就是有不少人用在农村工作的方法，处理接管城市中的问题，发生了一些混乱现象：如有的像当年红军打开城市时那样开仓济贫，把粮食布匹等物资分给贫民；有的地方也是允许农民进城挖宝，把地主在城里兼营的工商业也当“浮财”给“挖”得关了门，没法营业了；还有些进城部队的干部战士，对城市各阶层生活水准相差悬殊觉得不平，看到一些老板生活

阔绰就生气，个别住在商店里的干部战士，就故意吃喝不给钱或少给钱。这些现象的出现，和不少干部战士中存在一些糊涂认识有关。有的说：“抗日战争我们没有城市，不也胜利了吗？”“城市是地主资本家的窝子，打开后就该好好整他们一下！”在热河某地，有的部队竟一把火烧了天主教堂。此外，还发生了焚烧火车车厢，打碎灯泡，拆掉机器上的皮带钉鞋掌、做马缰，砍电线杆子当柴烧等现象。

因此，在1948年6月召开的东北财经会议上，李富春同志对这种现象进行了严厉批评，他说：现在我们已处在从掌握乡村转入掌握城市的过程中了，对城市的认识一定要有个根本转变。过去我们占领城市后，准备随时撤退，赶快抓一把物资供给战争，运不走的就分给穷人。但今天我们进城，不是准备撤退，不是要赶快抓一把，而是要利用城市组织生产力，发展生产，创造新的大批物资支援战争。今天对城市的政策不是破坏，而是维护建设。东北军区政委罗荣桓同志则主动承担责任。他说：城市的破坏，首先要由军队负责，因为进入城市后，找资财、争缴获的，都是军队干的。要求部队普遍进行纪律政策教育，检讨过去违反城市政策的现象。后来，根据罗荣桓的意见，颁发了东北人民解放军的8条《入城纪律守则》。这8条规定得到了在西柏坡的党中央的肯定，中央军委将这一守则转发全军，要求